

贵州省旅游扶贫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国家级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为例

杨庆¹, 张凤太¹, 安佑志¹, 吴建峰², 孙长城¹, 张越¹, 魏珍¹, 代思佳¹

(1.重庆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 重庆 400054; 2.贵州师范学院 地理与资源学院, 贵阳 550018)

摘要:为了巩固贵州省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采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叠置分析等方法分析了贵州省2 422个国家级乡村旅游扶贫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贵州省扶贫村整体呈不均衡的凝聚型分布特征,市域尺度下以凝聚分布为主,县域尺度下以均匀分布为主;(2)其地理要素上呈现“东南密,西北疏”的空间格局,有显著空间集聚特征;(3)其空间分布受到地形地貌、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区位的影响。有68.3%的旅游扶贫村集中分布在600~1 400 m的海拔区间内;有79.7%的旅游扶贫村分布于高A级景区(4A,5A)45 km以内;超过50%的旅游扶贫村位于交通主干道自驾1 h车程以内,且绝大部分旅游扶贫村远离省会和地级市经济中心。贵州省未来应重视旅游扶贫村之间的联系,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加快扶贫村旅游资源的整合,加强品牌建设;继续夯实乡村旅游基础建设,如完善交通路网。

关键词:旅游扶贫村;空间分布特征;GIS;贵州省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09(2021)06-0316-07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Villages in Guizhou Province

—Taking the National Key Villag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by Rural Tourism as an Example

YANG Qing¹, ZHANG Fengtai¹, AN Youzhi¹, WU Jianfeng²,

SUN Changcheng¹, ZHANG Yue¹, WEI Zhen¹, DAI Sijia¹

(1.School of Management,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4, China; 2.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sources, Guizhou Education University, Guiyang 550018,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overlay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2 422 national-level rural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villages in Guizhou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villages in Guizhou Province unevenly distributes, with agglomeration distribution at the municipal scale and uniform distribution at the county scale; (2) the geographic elements of the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villages show the spatial pattern of dense southeast and sparse northwest, and they have the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villages in Guizhou Province is influenced by topography, tourism resource endowment, and traffic location. There are 68.3% of the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villages concentrated in the altitude range of 600~1 400 m; 79.7%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villages are located within 45 km of high A-level scenic spots (4A,5A); more than 50% of the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villages are located within 1-hour drive of the main traffic road, and most of the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villages are far away from the urban economic center. In the

收稿日期:2020-11-19

修回日期:2020-12-11

资助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AJY005);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20XJCZH001);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基金(KJQN201901129);重庆理工大学科研启动基金(2019)

第一作者:杨庆(1996—),女,四川眉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E-mail:18683347181@163.com

通信作者:张凤太(1979—),男,山东沂南县人,教授,主要从事资源环境管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zhfthero45@cqu.edu.cn

future development of Guizhou Province, more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the links between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villages.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villages in Guizhou Province are suitable for vigorously developing global tourism. Guizhou Province should speed up the integr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villages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brand products. Guizhou Province should continue to consolidat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tourism infrastructure, such as improving the transportation and road network.

Keywords: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villag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GIS; Guizhou Province

今年是我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旅游扶贫模式在精准扶贫的重要指导思想下应运而生,旅游扶贫是精准扶贫的创新,也是产业扶贫的重要抓手。旅游扶贫通常是在具备一定旅游资源、区位优势、市场基础的贫困地区,通过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一种扶贫方式^[1]。与其他扶贫模式相比,旅游扶贫的优势是既能增加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还能带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2015年,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旅游局发布了“贫困村旅游扶贫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全国共有560个村落入选为旅游扶贫试点村,并且取得显著成效,此次工作指明了旅游扶贫的方向,同时为旅游精准扶贫奠定了基础;2016年全国旅游扶贫力度加大,“关于印发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的通知”的发布,全国共有22 651个村落被评为国家级旅游扶贫重点村,全国旅游扶贫工作正式进入崭新的阶段;2019年11月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贵州省旅游发展和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实施意见》,紧紧围绕“聚焦聚力旅游扶贫”和“衔接美丽乡村建设”设定基本思路。表明旅游扶贫一直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注重点,对于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研究具备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有关旅游扶贫问题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国外学者对于旅游扶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扶贫的概念^[3]、旅游与脱贫的关系研究^[4-5],旅游扶贫方法^[6-7]以及旅游扶贫效应评估等^[8-9]方面,偏于宏观尺度和概念理论的阐述。早年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研究不同尺度下的旅游扶贫问题,包括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10-11]、旅游扶贫的相关对策和建议^[12-13]、旅游扶贫机制及案例等^[14-15]。近年来,随着旅游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学者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扶贫绩效评估^[16-17]。此外也有学者开始从地理角度研究扶贫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18-19]。总体而言,国内外有关旅游扶贫的研究主要是从管理学、经济学、旅游学等角度进行定性研究,少有涉及定量研究,更少从地理学的角度对旅游扶贫地进行系统研究,尤其缺乏对旅游扶贫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1]。贵州省位于西部欠发达地区,《贵州省助力深度贫困县与极贫

乡镇脱贫攻坚人才需求白皮书》指出,截至2018年初,贵州省境内还有14个深度贫困县、20个极度贫困乡镇、2 760个深度贫困村,是我国的重点扶贫省份之一,也是全国第二多贫困人口省份。贵州省是我国较早实施旅游扶贫实践的省份,旅游扶贫是贵州省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以贵州省旅游扶贫地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典型性和示范性。因此,以2016年公布的贵州省2 422个国家级旅游扶贫重点村为研究对象,将数理统计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研究贵州省旅游扶贫村在市级尺度、县域尺度下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期拓宽旅游扶贫地区地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深化有关旅游扶贫地区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认识,为全面实现旅游脱贫、巩固已有脱贫成果提供对策和建议。

1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界于北纬24°37′—29°13′,东经103°36′—109°35′,位于中国西南腹地,云贵高原东部的滇东高原到湘西丘陵之间的过渡地带,全省总面积约17.61万km²。贵州省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境内地势起伏大,西部高、东部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平均海拔大约为1 100 m。如今贵州省是我国贫困人口数量第二多的省份,贫困人口不仅基数大,而且分布集中,其中91.2%的贫困人口、90.6%的贫困乡镇、92.1%的贫困村位于集偏僻、民族、生态问题于一身的集中连片区域^[19]。另外,省内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约占全省面积的70%,特殊的喀斯特地质地貌、原生的自然环境、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等使得贵州省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巨大潜力,为旅游扶贫奠定了资源基础。

1.2 数据来源

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中贵州省2 422个国家级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为研究对象,通过百度地图拾取系统获得旅游扶贫村的地理坐标,空间分析底图取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基于ArcGIS 10.3软件平台,将各矢量数据统一投影到Albers等积圆锥投影系。

2 研究方法

2.1 最邻近指数

将贵州省旅游扶贫村抽象为点状要素,通常用最邻近距离来表示点状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相互邻近程度,反映其空间分布特征。贵州省旅游扶贫村的空间分布类型可以归纳为以下 3 种:聚集型、均匀型及随机分布型。最邻近指数具体计算方法如下^[16]:

R = \frac{\bar{r_1}}{r_E} = 2 \sqrt{D} \times \bar{r_1} \tag{1}

\bar{r_1} = \frac{1}{2 \sqrt{\frac{n}{A}}} = \frac{1}{2 \sqrt{D}} \tag{2}

式中:R 为最邻近指数; $\bar{r_1}$ 为最邻近点之间距离的平均值; r_E 为理论最邻近距离;D 为点密度;n 为研究对象的个数;A 为研究区域的面积。当 R=1 时,即 $\bar{r_1}=r_E$,说明点状要素属于随机分布;当 R>1 时,即 $\bar{r_1}>r_E$,说明点状要素趋向于均匀分布;当 R<1 时,即 $\bar{r_1}<r_E$,说明点状要素呈现为凝聚型分布,且 R 值越小点要素凝聚程度越高。

2.2 洛伦兹曲线和集中化指数

贵州省旅游扶贫村的洛伦兹曲线绘制方法如下:先将贵州省各市(自治州)旅游扶贫村的数量由大到小进行排列,排列位序依次为横坐标,以小到大累加数目占总数的比例为纵坐标,生成的曲线为所求洛伦兹曲线。在洛伦兹曲线的基础上引入集中化指数,其表达式如下^[20]:

G = \frac{L - J}{M - J} \tag{3}

式中:G 为集中化指数;L 为贵州省旅游扶贫村实际空间分布时的累加比重之和;J 为贵州省旅游扶贫村均匀空间分布时的累加比重之和;M 为贵州省旅游扶贫村空间分布时是最大累计比重之和。G 取值大小反映旅游扶贫村集中化程度,0≤G≤1,当 G 越大表明旅游扶贫村集中化程度越高;当 G 越小表明旅游扶贫村集中化程度越低;当 G=1 表明旅游扶贫村空间分布集中于一个地区,当 G=0 表明扶贫村空间分布于各个地区。

2.3 核密度分析法

从数理分析的角度用最邻近指数和集中化指数在统计意义上描述扶贫村的集中程度,并不能真实反映地理要素的实际空间分布特征,因此引入核密度估计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KDE)来反映扶贫村地理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可以与最邻近指数和集中化指数起到互补作用^[20]。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tilde{\lambda}_h(s) = \sum_{i=1}^n \frac{3}{\pi h^4} \left[1 - \frac{(s-s_i)^2}{h^2} \right]^2 \tag{4}

式中: $\tilde{\lambda}_h(s)$ 为核密度估计值;s 为待估旅游扶贫村的位置; s_i 为落在以 s 为圆心的旅游扶贫村;h 为半径的空间范围内的第 i 个旅游扶贫村的位置。

2.4 叠置分析

叠置分析是把 2 个及以上不同的图层要素进行叠加,形成一个新的图层,便于对比分析不同图层要素之间的关系^[21]。本文是将贵州省旅游扶贫村的地理信息与贵州省的其他属性图层,如海拔高度、旅游资源的缓冲区、交通主干道的缓冲区等进行叠加,并统计不同海拔高度、不同缓冲区内旅游扶贫村的数量,以此对比分析贵州省旅游扶贫村在各种要素上的分布差异。

3 结果与分析

3.1 扶贫村空间分布特征

3.1.1 空间分布类型 借助 ArcGIS 10.3 计算出贵州省旅游扶贫村在各市、各区县内空间分布的 R 统计量。在市域尺度下(表 1),其中最邻近指数 R>1 的只有贵阳市,表明贵阳市境内旅游扶贫村空间分布类型为均匀型;其余市(自治州)最邻近指数 R 均小于 1,表明绝大部分市(自治州)境内旅游扶贫村空间分布类型属于凝聚型。黔南州的 R 值最小,表明其境内旅游扶贫村聚集程度最高;黔西南州的 R 值最大,表明其境内旅游扶贫村聚集程度最低。从全省来看,贵州省旅游扶贫村最邻近指数 R=0.745,<1 表明贵州省扶贫村空间分布类型属于凝聚型,空间分布呈现出集聚态势。

表 1 贵州省各市域旅游扶贫村的最邻近距离指数

市(自治州)	平均最邻近距离/km	期望最邻近距离/km	最邻近指数	类型
遵义市	3.56	4.54	0.78	凝聚分布
黔东南州	3.97	5.35	0.74	凝聚分布
铜仁市	3.38	4.47	0.76	凝聚分布
毕节市	4.55	5.86	0.76	凝聚分布
黔南州	4.36	6.56	0.66	凝聚分布
安顺市	2.99	3.89	0.77	凝聚分布
黔西南州	4.76	5.94	0.80	凝聚分布
六盘水市	3.71	5.10	0.73	凝聚分布
贵阳市	4.86	3.00	1.62	均匀分布

在县域尺度上,旅游扶贫村以均匀分布为主、凝聚分布为辅(图 1)。最邻近指数 R>1 的区县占比约为 62%,表明大部分区县内旅游扶贫村为均匀分布型。其中都匀市 R 值最高,为 2.48,说明其区域内旅

游扶贫村空间分布最为均匀。最邻近指数 $R=1$ 的区县只有大方县,其境内旅游扶贫村为随机分布类型。 $R<1$ 的区县占比约为 37%,其中惠水县的最邻近指数 R 值最低,为 0.58,表明惠水县旅游扶贫村空间分布聚集程度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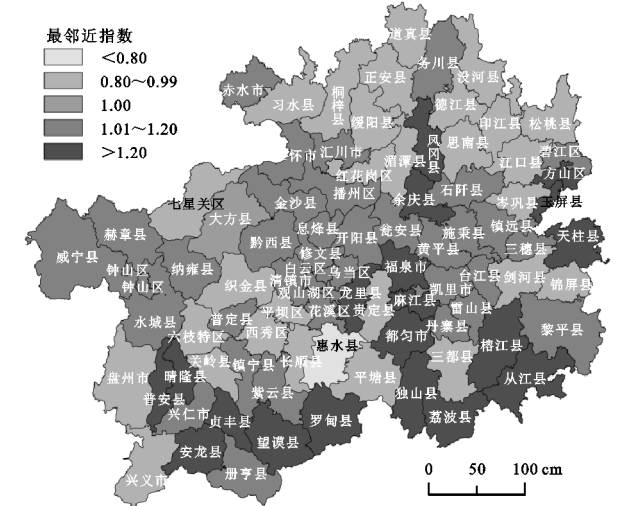


图1 贵州省各县域旅游扶贫村最邻近指数值空间分布

3.1.2 空间分布均衡性 通常,地理集中指数是用于衡量研究对象的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标,地理集中指数值越高表明研究对象空间分布越集中,反之,越分散^[22]。市域尺度下,贵州省旅游扶贫村实际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数 $G=37.97$,而在均匀分布状态下的地理集中指数 $G_0=11.11$, $G>G_0$ 表明贵州省旅游扶贫村在市域尺度下空间分布较为集中。县域尺度下,贵州省旅游扶贫村实际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数 $G=13.24$,在均匀分布状态下的地理集中指数 $G_0=1.23$, $G>G_0$ 表明贵州省旅游扶贫村在县域尺度下空间分布同样较为集中。

洛伦兹曲线和集中化指数可以进一步衡量贵州省旅游扶贫村的空间集中化的程度、集中区域。贵州省各市扶贫村数量从大到小排列情况见表2,再根据表2数据绘制洛伦兹曲线(图2)。

表2 贵州省旅游扶贫村各市分布

地区	个数/个	所占比例/%	累计比重/%
遵义市	587	24.24	24.24
黔东南州	342	14.12	38.36
铜仁市	319	13.17	51.53
毕节市	307	12.68	64.20
黔南州	271	11.19	75.39
安顺市	209	8.63	84.02
黔西南州	202	8.34	92.36
六盘水市	173	7.14	99.50
贵阳市	12	0.50	100.00

如图2所示,贵州省扶贫村的洛伦兹曲线呈现上凸趋势,说明扶贫村的空间分布比较集中。贵州省的扶贫村主要集中分布于遵义市、黔东南州和铜仁市,这3个市的旅游扶贫村之和占总数的50%多;毕节市和黔南州次之;贵阳市最少,仅占0.5%。计算得贵州省扶贫村空间分布集中化指数 $G=0.32$,在取值范围内,表明贵州省扶贫村整体上呈现集聚特征,但集中化程度较低,与地理集中指数得出结论较为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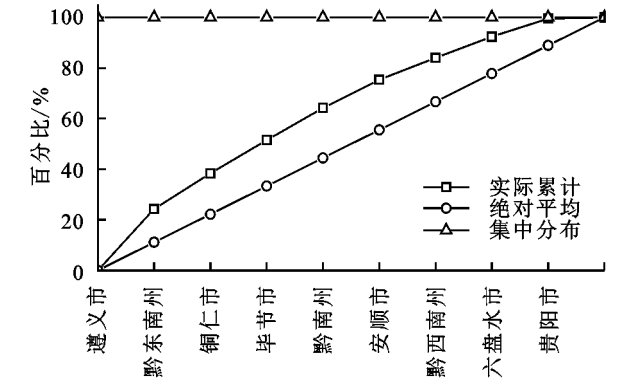


图2 贵州省旅游扶贫村空间分布洛伦兹曲线

3.1.3 空间集聚及扩散程度 借助软件 ArcGIS 10.3 对贵州省旅游扶贫村进行核密度估计,生成贵州省旅游扶贫村空间分布核密度图(图3)。贵州省旅游扶贫村整体上呈现“东南密,西北疏”的空间格局,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大体体现为“四核、一带、一点”的空间特征。“四核”是指4个核心聚集区,即黔南州西部的长顺县;黔南州和黔东南州接壤的丹寨县和三都县;黔东南州中部的剑河县和台江县;铜仁地区江口县、碧江区及万山区相邻的边界地带。“一带”是指4个核心区域与若干相对集中区域形成的一条反“S”形的聚集条带区,主要涉及铜仁地区、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以及安顺市的部分区县。“一点”是指相对集中的点状区,位于毕节地区大方县与七星关区接壤的中部地区。结合贵州省的地形地貌综合分析,这些区域平均海拔较高,地势起伏较大。黔东南位于贵州高原东部边缘斜坡地带,地势自西向东倾斜,地表较破碎;黔南多为山地河谷区,位于苗岭山系,黔中两级剥夷向广西丘陵倾斜的斜面上,地势北高南低,地表起伏较大;黔西南多为山原丘陵盆地区,地势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山地居多。地形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地发展,但使得这些地区的自然、人文资源得以保存完好,有利于旅游业发展;此外,旅游扶贫村多分布于相邻市县的接壤处或者边界地区,受经济行政中心带动辐射作用较小,人民生活较为贫困。

3.2 影响因素分析

3.2.1 地形地貌 地形地貌是影响人类生产生活、交通建设、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旅游扶贫村是

以开展乡村旅游、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为基础,对自然环境有一定要求。以海拔高度作为考察地形地势对贵州省旅游扶贫村空间分布的影响。将贵州省旅游扶贫村的空间分布图与贵州省地形高程图进行叠加(图 4)。贵州省旅游扶贫村主要分布于海拔 239~2 544 m 区间内,以 200 m 为区间单位对贵州省旅游扶贫村海拔进行分阶段统计(图 5)。在海拔高度为 800~1 000 m 区间内旅游扶贫村分布最多;海拔高于 1 000 m 往后,贵州省旅游扶贫村分布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数量逐渐减少,海拔高于 2 400 m 往后旅游扶贫村达到个位数。综合统计,海拔高度在 600~1 400 m 区间内的旅游扶贫村数量占比达 68.3%。低海拔地区,由于交通较为便利,城镇化水平较高等因素使得旅游扶贫村数量很少;高海拔过高,并不适合居住,因此高海拔地区的旅游扶贫村分布也很少。贵州省 92% 的面积为山地和高原,平均海拔在 1 100 m 左右,与旅游扶贫村主要集中于分布区间较为吻合。这些地方一方面环境相对独立,受外界干预少,保存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为设立旅游扶贫村创造了条件。可见贵州省地形地貌是影响旅游扶贫村空间分布的因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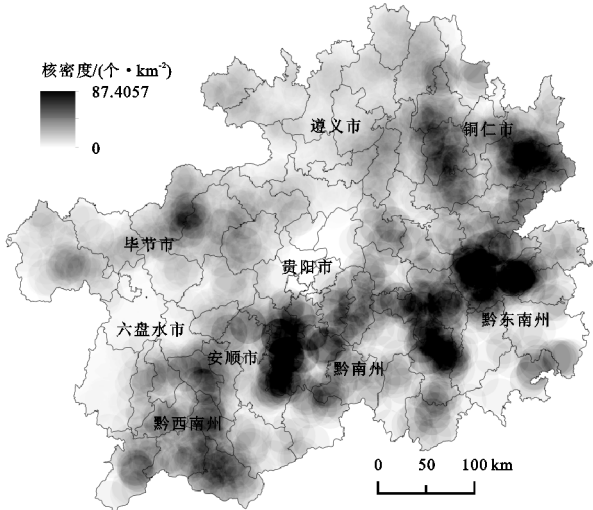


图 3 贵州省旅游扶贫村空间分布核密度

3.2.2 旅游资源禀赋 旅游资源禀赋是开展旅游扶贫的基础条件^[15],我国旅游资源禀赋多表现为不同等级形式的旅游景区^[1]。截至 2016 年末,贵州省境内共有 156 个 A 级景区,包括 4 个 5A 级景区和 66 个 4A 级景区。拥有良好品牌效应、基础条件相对完善的较高级别的旅游景区(如国家级 5A,4A 级景区)对周边乡村旅游具有较强辐射效应^[15]。以贵州省 5A,4A 级景区为圆心,以 15~45 km 等间距为缓冲半径,建立 4A 级以上景区缓冲区(图 6)。以 15 km 为半径的缓冲区内共有 571 个旅游扶贫村;以 30 km 为半径的缓冲区内共有 1 361 个旅游扶贫村,超过总

数的一半;以 45 km 为半径的旅游资源缓冲区内共有 1 930 个旅游扶贫村,占总数的 79.7%。缓冲半径增加,范围内旅游扶贫村数量随之增加,表明旅游扶贫村的空间分布受旅游资源禀赋影响,且旅游扶贫村周围都蕴藏着丰富的可供开发旅游资源。旅游扶贫村与旅游景区之间存在共生关系,一方面,可以形成旅游景区带动周边旅游扶贫村的杠杆效应;另一方面,旅游扶贫村发展乡村旅游同样会促进旅游景区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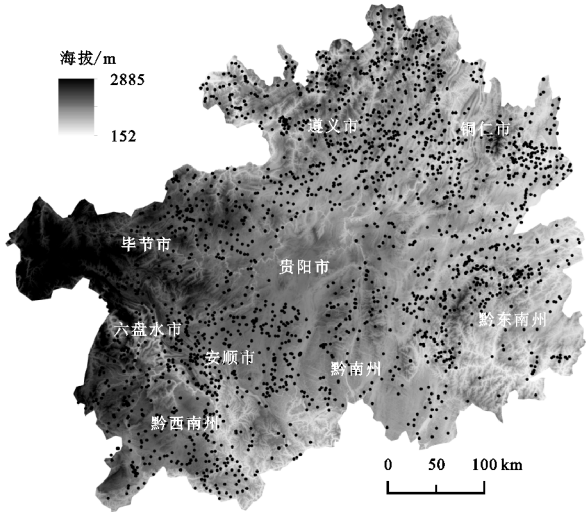


图 4 贵州省旅游扶贫村与地形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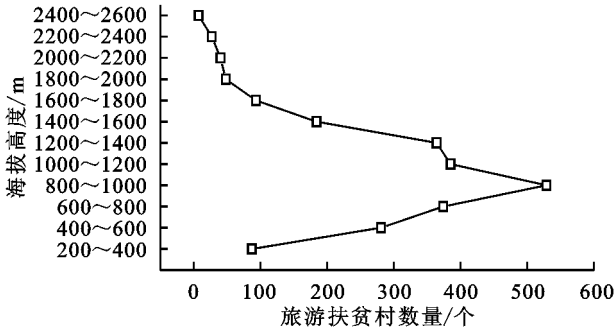


图 5 贵州省旅游扶贫村分布与海拔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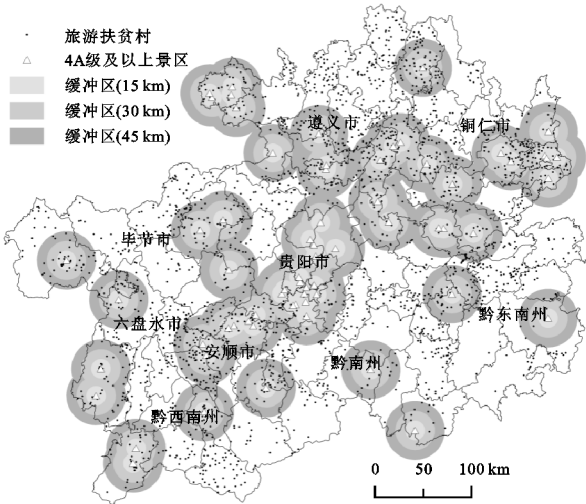


图 6 贵州省旅游扶贫村与 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缓冲区

3.2.3 交通区位 旅游扶贫村发展乡村旅游,其客源主要集中于近域市场,即地级市和省会城市,因此尤为依赖陆路交通。因此,分别以国道、主要客源城市为中心进行缓冲分析。按照较强游客体验标准:骑行或者自驾到主要交通道路 1 h 车程以内距离为 15, 40 km^[1]。因此分别选取国道 15, 40 km 为缓冲半径,与旅游扶贫村进行缓冲分析(图 7)。经统计,以国道 15 km 的缓冲半径范围内共有旅游扶贫村 599 个,占比 24.7%;以国道 40 km 为缓冲半径范围内共有旅游扶贫村 1 273 个,占比 52.6%。缓冲区内旅游扶贫村的数量随着缓冲半径的增加而增加,且超过一半的旅游扶贫村位于自驾 1 h 车程以内,表明贵州省旅游扶贫村空间分布受区位交通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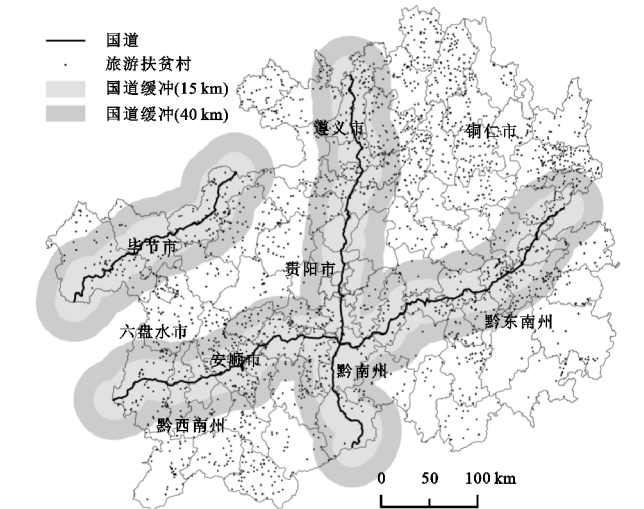


图 7 贵州省旅游扶贫村与国道缓冲区

根据已有研究表明,通常省会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范围为 100 km,地级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范围是 50 km^[23-24],因此分别以 100, 50 km 为半径,建立两者的缓冲区,并与贵州省旅游扶贫村进行叠置分析(图 8—9)。结果表明以贵州省省会城市为中心,100 km 为半径的缓冲区内共有旅游扶贫村 357 个,占比为 14.7%;以贵州省地级市为中心,50 km 为半径的缓冲区内共有旅游扶贫村 928 个,占比为 38.3%。表明贵州省旅游扶贫村主要分布于城市边沿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共享程度较低,交通可达性较低。

落后的交通条件有利于保存原始生态环境、培育地域特色风土人情,这些都是发展乡村休闲旅游的原动力,是极具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但交通区位条件落后通常都是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良好的可进入性是旅游扶贫村顺利脱贫的重要保障。贵州省应进一步摆脱交通制约,提高旅游扶贫村的可进入性,建设乡村旅游公路、慢行绿道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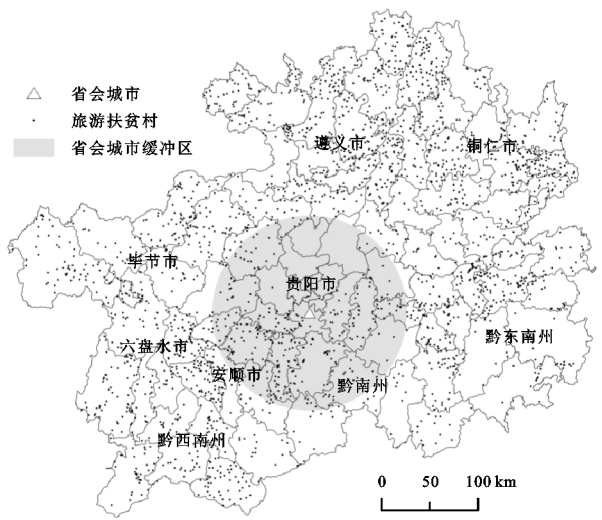


图 8 贵州省旅游扶贫村与省会城市缓冲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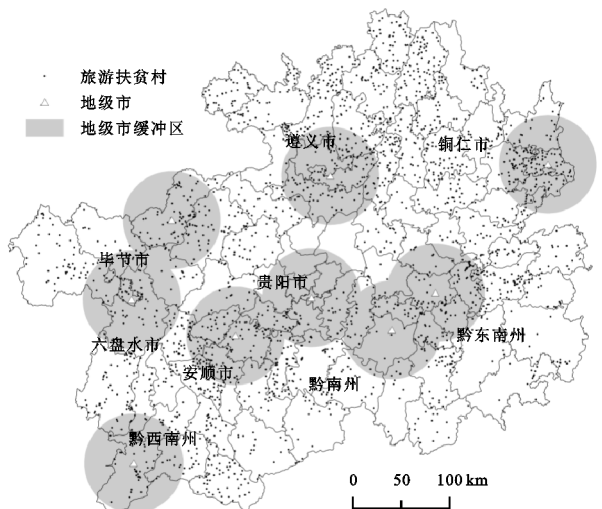


图 9 贵州省旅游扶贫村与地级市缓冲区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将贵州省旅游扶贫村视为点状要素,最邻近指数和集中化指数证实了贵州省旅游扶贫村整体呈现凝聚型分布,空间存在较大差异,且市域尺度比县域尺度下分布更加集中;通过核密度估算,揭示了贵州省旅游扶贫村呈现东南密、西北疏,在黔东南形成集中连片的带状空间格局;热点分析表明贵州省旅游扶贫村具有明显高值区,且市域、县域尺度下高值聚集区具有重合性,即旅游扶贫村分布密集的区域集中在黔北的遵义、铜仁地区。

贵州省旅游扶贫村空间分布受地形地貌、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区位和政策导向的影响较为明显。研究表明,海拔 1 000 m 左右是贵州省旅游扶贫村集中分布的沃土,丰富的旅游资源是旅游扶贫村发展的前提,交通区位则是旅游扶贫村发展布局的关键,政策导向是旅游扶贫村发展的保障。

4.2 建议

(1)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贵州省旅游扶贫村呈现分布广泛,局部凝聚的特征,有利于全域旅游的发展。在市域尺度上,除了贵阳市以外的地级市都呈现凝聚型分布,尤其是遵义市境内旅游扶贫村的数量最多,占总数的24.24%,且遵义市为全国知名的红色文化旅游胜地,因此应加快推进遵义市的红色全域旅游发展,并积极探索遵义市的红色研学旅游。此外,贵州省旅游扶贫村在黔东南形成了集中条带状聚集区,黔东南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可以将黔东南的少数民族风情、民族特色手工艺品等充分融合到乡村休闲旅游中,进一步规划一条主打民族风情的乡村休闲旅游线路。

(2) 打造山地户外运动项目。贵州省以山地和高原为主的独特地形地貌形成了众多旅游扶贫村,同时也显著影响了旅游扶贫村的脱贫效率。贵州省旅游扶贫村多分布于海拔1 000 m左右地区,这些地方由于交通闭塞,保存了较好的原生生态环境,为开展户外极限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地区的旅游扶贫村可以大力打造山地户外运动项目,以吸引年轻的游客群体。

(3) 加快公路网建成。“要致富先修路”,高密度的路网带来的便利交通往往促进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贵州省旅游扶贫村受区位交通制约,可进入性较差。贵州省应进一步合理规划其交通布局,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加快公路网建设;此外还应解决好旅游扶贫村“最后一公里”问题,规划自驾与公共交通相结合的乡村休闲旅游路线。

(4) 合理规划整合旅游资源,加强品牌建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游客肯定会越来越趋向选择高质量的旅游目的地。因此,贵州省旅游扶贫村应充分挖掘当地旅游资源特色,集中力量发展重点旅游项目,积极探索发展乡村夜间休闲项目、特色文娱活动,打造一批高质量的乡村民宿、精品客栈,进而积极申报创建A级景区、旅游休闲度假区等品牌。

(5) 继续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的《2020年乡村产业工作要点》指出,做好今年乡村产业工作的“七大要求”之一是要积极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增添乡村产业发展亮点。贵州省也应结合自身条件,对发展贵州省乡村休闲旅游给予政策支持。通过政策支持可以进一步激发贵州省旅游扶贫村村民参与乡村休闲旅游的热情,使村民真正成为旅游扶贫的受益者,使利益分配更加均衡化,实现旅游扶贫村的可持续发展,达到巩固脱贫的效果。

文章研究了贵州省旅游扶贫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并对旅游扶贫村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建议,对于提高贵州省旅游扶贫村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实现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文章只大致讨论了贵州省旅游扶贫村的影响因素,并未深入探究各因素的显著性,也未关注到各个旅游扶贫村的经济发展的变化、空间可达性情况,这些都是今后仍需努力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参考文献:

- [1] 朱磊,胡静,许贤棠,等.中国旅游扶贫地空间分布格局及成因[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11):130-138.
- [2] 巫昊燕.基于精准扶贫的重庆市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10):244-249.
- [3] Zeng B, Ryan C. Assisting the poor in China through tourism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research[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33(2):239-248.
- [4] Job H, Paesler F. Links between nature-based tourism, protected area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rises: The example of Wasini Island (Kenya)[J].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and Tourism, 2013,1/2: 18-28.
- [5] Rid W, Ezeudui I O, Pröbstl-Haider U. Segmentation by motivation for rural tourism activities in The Gambi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40:102-116.
- [6] Parker S, Khare A. Understanding success factors for ensuring sustainability in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Africa[J]. Journal of Ecotourism, 2005,4(1): 32-46.
- [7] Sharpley R.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ourism: A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ed approach[J]. Tourism Management, 2016,56(10):207-208.
- [8] Ap J, Crompton J L. Developing and testing a tourism impact scale[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8,37(2):120-130.
- [9] Anderson W. Cultural tourism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Kilimanjaro, Tanzania[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2015, 13(3): 208-224.
- [10] 李益敏,蒋睿.怒江大峡谷旅游扶贫研究[J].人文地理, 2010,25(6):131-134.
- [11] 江晓云.少数民族村寨生态旅游开发研究:以临桂东宅江瑶寨为例[J].经济地理,2004,24(4):564-567.
- [12] 李会琴,侯林春,杨树旺,等.国外旅游扶贫研究进展[J].人文地理,2015,30(1):26-32.
- [13] 陈友华.我国旅游扶贫模式转型升级新思路[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4,30(6):717-721.